

# 人类之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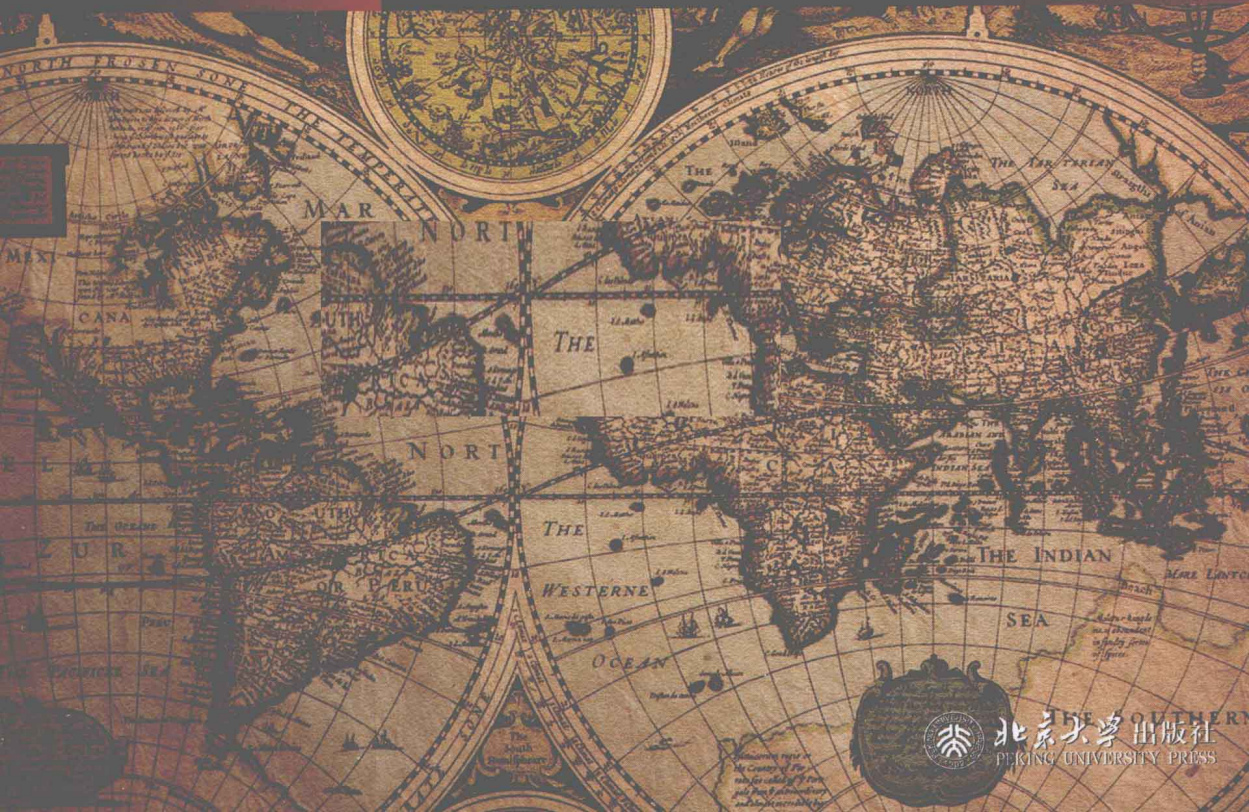
## 鸟瞰世界历史

[美] 约翰·R. 麦克尼尔(J. R. McNeill) 著  
威廉·H. 麦克尼尔(W. H. McNeill)  
王晋新 宋保军 等 译

### 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世界史图书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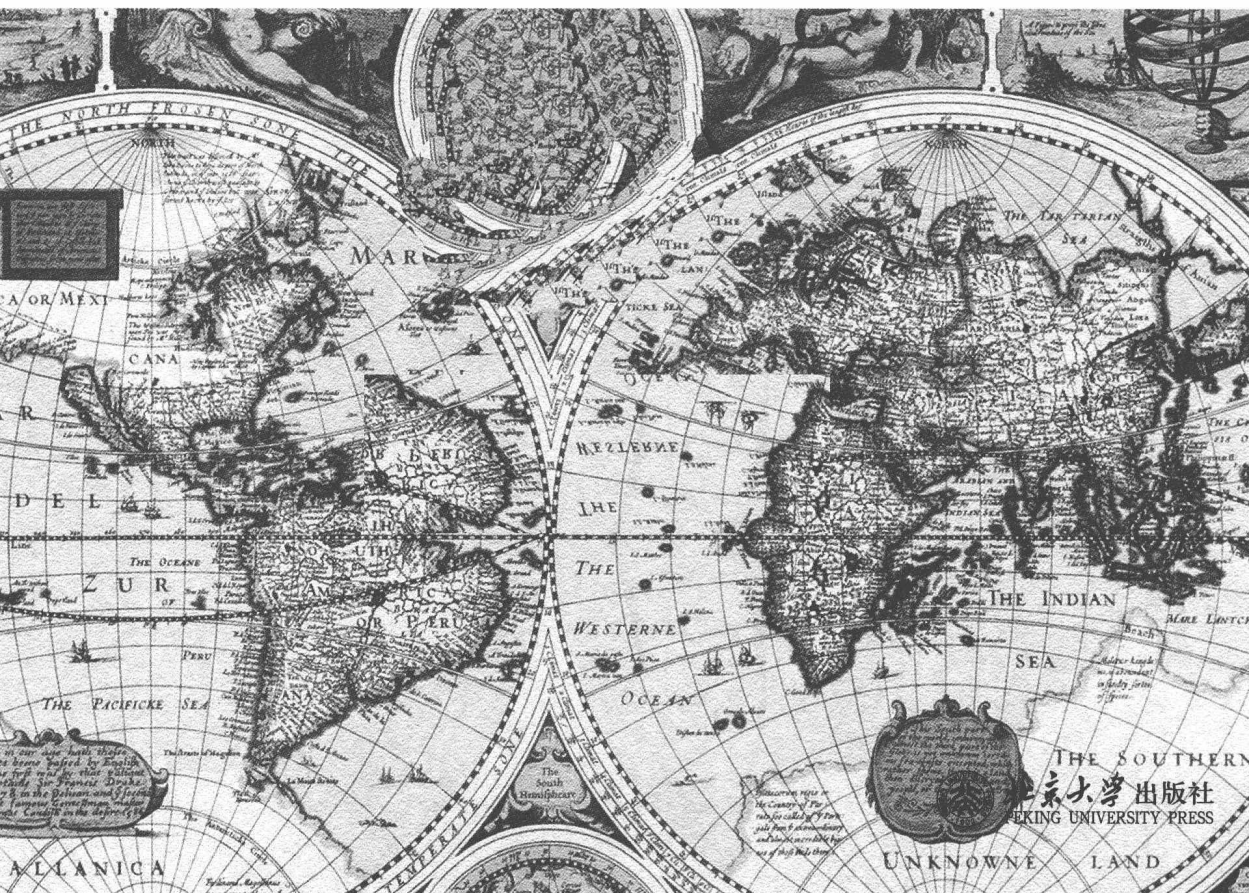
世界史图书馆

# 人类之网

## 鸟瞰世界历史

[美] 约翰·R. 麦克尼尔(J. R. McNeill) 著  
威廉·H. 麦克尼尔(W. H. McNeill) 著  
王晋新 宋保军 孙义飞 张楚乔 徐宏峰 译  
王晋新 校

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UNKNOWN LAND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16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美)麦克尼尔(McNeill, J. R.), (美)麦克尼尔(McNeill, W. H.)著;王晋新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301-19154-5

I. ①人… II. ①麦…②麦…③王… III. ①世界史-普及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7916号

**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John R. McNeill and William H. McNeill

copyright © 2003 by J. McNeill and William H. McNeill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Gerard McCauley Agency, Inc.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书 名: 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

著作责任者: [美]约翰·R. 麦克尼尔 威廉·H. 麦克尼尔 著 王晋新 等译

责任编辑: 岳秀坤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154-5/K·078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mailto: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mm × 1020mm 16开本 24.25印张 407千字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3.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献 给

E. D. M.

# 译者序言

王晋新

—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 1917— ),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1985年曾出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著述甚多, 声名远播, 被誉为美国“新世界历史运动的领军人物”<sup>①</sup>和“世界历史的‘现代开创者’”<sup>②</sup>。然笔者学力甚浅, 孤陋寡闻, 晓知麦克尼尔之名也晚。记得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 翻阅杨豫先生所译的英国著名学者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时, 才初识此人。巴勒克拉夫教授言: “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 最有推动作用的是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 其中恐怕要以 L. S. 斯塔夫里亚诺斯和 W. H. 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sup>③</sup>说初识, 是因为只知其名而已, 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 笔者并未读过一部麦氏的著作。故而, 自己既无法确切地了解这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和观念, 更无从体味巴勒克拉夫教授所说的那种“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世界史著述的“独特特征”究竟为何物。大约在世纪之交前后, 因将文明史作为自己一个新的学术探讨领域以及近些年来国内诸多高校和学术界对“全球史观”的关注等诸种缘故, 自己才开始在阅读中对麦氏稍加以留意, 当然, 这种留意或关注更多地还局限在国内外其他史学家对麦氏史学成就与地位评价的层

---

① 拉尔夫·克劳伊泽尔: “艺术与世界历史”, 载刘新城主编: 《全球史评论》第一辑, 商务印书馆, 2008年, 第203页。

② 贡德·弗兰克: 《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刘北成译, 中央编译局出版社, 2000年, 第10页。

③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杨豫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 第245—246页。

面之上,故而,其过程必然是断断续续,其印象也必然是只鳞片爪,断不成系统。

本人所完整阅读麦氏的第一部著述是台湾学者杨玉龄所译的《瘟疫与人》。<sup>①</sup>其独特的观点和鲜明的主张对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与震撼,使自己对人类的文明历程和世界文明史的时空观察视野大为拓展。此后,自己方开始较为认真地接触麦氏的史学思想与观念。

2005年,偶然间,自己拿得到了一部麦克尼尔与其子约翰·R. 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事务学院教授)<sup>②</sup>合著的一部著作:*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初始,只是想泛泛地浏览一遍,以期补充自己的知识和为教学中对西方欧美史学前沿动态的介绍增添一点内容而已。不料,拿起后却无法再放得下。不仅自己读得津津有味,圈圈点点,也将其列为硕士班和博士班的学生们的重点阅读和重点研讨书目。特别是一些学界好友,如清华大学的刘北成教授等得知自己这种痴迷之后,便鼓励自己将其翻译成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岳秀坤先生也对我予以积极的鼓励与支持,他不仅主动承担了联系版权、出版立项等诸多事务,同时还给予我以相当宽松的期限。正是在这背景下,自己与身边的几位年轻学子一边读书研讨,一边联袂将其译成中文。

在阅读和翻译期间,自己尚留意了一下麦氏所有的著述在华语世界的境况。稍加梳理,便令笔者感到汗颜。因为,麦氏本人的二十余部著作中,已有许多被诸多中国学者关注并介绍给了国内学术圈,如大陆和香港地区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英国与俄国,它们之间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America, Britain & Russia 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941-1946*,该书为汤因比主编的《国际事务概览》第5卷)、《西方文明史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Handbook*)、《竞逐富强》(*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 D. 1000*)<sup>③</sup>;台湾地区

① 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杨玉龄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年。

② 该教授的主要著述有:《大西洋美洲的各个社会:从哥伦布到奴隶制废除,1492—1888年》(*Atlantic American Societies: From Columbus through Abolition, 1492—1888*, London, 1992)、《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的环境史》(*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New York, 2000),该书于2001年获美国世界史协会最佳图书奖。

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英国与俄国,它们之间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西方文明史纲》:张伟平等译,胡代聪等校,新华出版社,1992年;《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倪大昕、杨润殷译,刘锋校,学林出版社,1996。该书译稿是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所提供的;另,该书译者将麦克尼尔译为麦尼尔。



尚有《西方的兴起》、《世界通史》(A World History)、《西洋文明史大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Handbook)、《欧洲史新论》(The Shape of European History)和《瘟疫与人》等。<sup>①</sup>特别是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将麦氏的《世界史》一书的英文影印本公开发行,中文译本也即将推出。此外还有一篇重要文献是必须要提及的,即王加丰先生所译介的麦克尼尔本人在1985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所发表的长篇演讲致辞《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一文。<sup>②</sup>如此算来,麦氏作品被译成中文的共计有7种10余部(篇)之多。据笔者所知,当今能够以如此规模被引进、介绍给中国史学界的西方历史学家还不多见。

国内学者对麦氏史学成就曾作过一些分析评述,如郭方先生曾撰专文评介麦氏的《西方的兴起》一书<sup>③</sup>;钱乘旦先生撰文评介麦氏的《世界史》<sup>④</sup>。再如,张广智、张广勇二位先生也从史学自身发展变革的角度,对麦克尼尔的著述和特点以及他在西方或欧美史学史的地位进行了简要的评介,视其为二战以后,西方世界史编撰中具有“崇尚整体与宏观视野”的作品之一。<sup>⑤</sup>尚有一些评述是以同其译著相结合的“译者序言”的方式出现,如台湾学者刘景辉先生所撰写了一篇名为“论历史教育的时代意义:由《西方的兴起》谈起”的长文。刘先生是麦氏《欧洲史新论》一书的译者,在该书出版时,他将此文作为该书译者序附在书中。此外,尚有陈方正先生为《竞逐富强》一书译本的序言。它们或结合麦氏某种著述文本本身,或对于麦氏著述中的某种观点有感而发,对麦氏的史学思想与成就进行评点,多有独到之处和精妙之论。在此不作赘述,敬请读者们自行鉴析、品鉴。

## 二

1978年,英国著名学者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曾多次对麦

- 
- ① 其中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Handbook* 一书被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分别译为《西方文明史纲》和《西洋文明史大纲》; *A World History* 也被分别称为《世界史》和《世界通史》。
- ② 麦克尼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王加丰译,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 ③ 郭方:“评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第95—102页;“评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及全球史研究”,《全球史评论》第一辑,第63—74页。据笔者本人所知,郭方先生是国内较早关注麦克尼尔史学成就并对其进行翻译、评介的学者之一。
- ④ 钱乘旦:“评麦克尼尔《世界史》”,载《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该文后作为北京大学出版社麦克尼尔《世界史》影印版的“导读”。
- ⑤ 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8、189、326、383页。

克尼尔的史学思想和主张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特别推崇其撰著的《世界史》为“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和“最为著名的”著作之一。<sup>①</sup>这一评价奠定了后来史学界对麦氏史学成就的地位与作用的认知基调,也确实得到了包括中国史学界在内的国际史学界的广泛认同。但在笔者看来,似乎人们对麦克尼尔史学成就的认知和评估更侧重于他对当代史学的贡献这一个方面,而对其产生的背景和缘由,尤其是麦克尼尔对以往西方传统史学的认识和批判还欠充分和深入。而从学术史角度上讲,明晰麦克尼尔学术主张的“内在理路”和“外缘背景”,实为辨析其成就和影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麦克尼尔的史学思想,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体现出来的,一是在其数量繁多的各类的专业著作中,通过对各种具体的历史现象、运动或历程的分析与认知来述说他自己对历史的感悟;二是以一些专题性较强的论著集中地阐发他自己的某些思考,申明自己的某些学术主张。笔者以为这其中尤以《欧洲史新论》一书为最。<sup>②</sup>这部著述虽非麦氏成名之作,但却集中地反映了他对历史、历史学以及美欧历史学研究与教学现状的通盘思考与反思,实为欲了解和研析麦氏史学思想主张者所不可不读的文著。

### 对“维多利亚史观”的反动与挑战

20世纪上半叶,是大西洋两岸英美诸国史学一个相当繁荣发展的时代,其中一个极为醒目的重要标志就是由英国著名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领衔主编的《剑桥现代史》第1卷于世纪初年刊行问世。此时,据麦氏本人讲:正值大西洋两岸的近代史教学刚刚专业化,列入中学与大学的课程之中。<sup>③</sup>进入20年代,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创了一门名为“西方文明史”的课程。30年代,其他大学也纷纷跟进,开设这一课程。40与50年代可谓是“西方文明史”课程的全盛时代。几乎各个大学都将其列为学生必修核心的课程。然而,及至20世纪60年代之后,由于种种缘故,“西方文明史”

①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45—246页。该书是他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系列丛书的历史学卷。

② 该文原名为《欧洲历史的形态》(*The Shape of European History*),刘景辉先生在翻译时考虑该文集中地体现了麦氏对欧洲历史的新的理论主张,故而以作为《欧洲史新论》。请见该著“译者序”第12页。这篇著作最后公诸于世的形式虽是一部专著,其实原文是麦氏在1972年提交给第十一次国际人类学和人类学大会的长篇专题论文。全文共计五章,《欧洲史新论》一书只抽取了其中三章。

③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5页。



一课却在英国大学教育中开始没落，“不是被干脆取消就是被列为选修课程，而学生们当然也不再拿这门课程是一回事了”<sup>①</sup>。至于这种情形究竟为何出现，麦克尼尔从几个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麦克尼尔认为，《剑桥现代史》的第1卷中，“清楚地显示出欧洲史的整个意义——自由的扩张史，这就是欧洲史的基本形态。因此，这些在英国和美国担任近代史教学的第一代人物在《剑桥现代史》中找到了他们的目标，找到了他们的楷模”。于是该书的观点“很快成为英美大中学校欧洲近代史课程与教科书结构的基本骨架”。而“《剑桥现代史》成于维多利亚时代”，所以该书的指导史观“又可称为维多利亚史观”。从社会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麦克尼尔认为“将英语世界三代学者、专家对历史的了解组织起来的确是一项伟大的成就。那些赋予欧洲近代史这样庄严伟大意义的19世纪人们，值得我们衷心感佩。的确，将人类历史看成是一个在自由政治制度的范围之下走向更完善的自由境界的漫长与连续的演进过程，应该算是该世纪的主要学术成就之一”，而且“它不仅取代了传统的基督教神定历史观，而且对于英美两国的政府活动所受到的限制与约束，也找到了合法的理论根据。所以它也成为大部分英美人士对欧洲史的看法。尤其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厘定，会产生左右的力量”<sup>②</sup>。就上述文字而言，笔者以为麦克尼尔对维多利亚史观的兴起、传播以及其所具有的时代作用与意义的认知与评价应该说是还比较客观的。我们可以英国著名学者巴勒克拉夫在谈及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时的观点作为佐证，他指出，只有将其“放在19世纪以来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更加宽阔的背景下加以思考时，才可能做出恰如其分地评价”。“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家在方法论和理论观点方面仍然严重地依赖于19世纪末的老一辈历史学家，从而保持着连续的传统”。而“这个时期历史研究中最突出的成果当推《剑桥近代史》。这套多卷本的巨著是阿克顿勋爵计划的。虽然它的第一卷在1902年问世时，阿克顿勋爵已经溘然长逝，但它的意义重大，这不仅因为它被认为是国际通力合作的事业，而且还因为受德国式教育并有日耳曼人血统的阿克顿勋爵才具备弥合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差距的特殊资格，因为它把德国和西欧的历史思想和实践的成果融为一体。《剑桥近代史》的写作主旨是企图把19世纪已经取得的进展确立下来；同时，按阿克顿自己

---

①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7、12页。

②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6—7页。

的说法是‘为来到的世纪指明方向,制定规划’。”<sup>①</sup>

那么究竟是什么缘故致使 19 世纪这种史观在盛行了一段时日之后,又中道衰落呢?通过一番细密的分析,麦克尼尔得出了自己的看法,即“事实上,维多利亚历史观并不是正确的历史观”。因为它并没有正确或完整的揭示出西方或欧洲文明发展的真谛,“如德国历史的发展就不能用维多利亚史观来解释……此外,自 1918 年之后,英美人士所谓的自由并未很迅速地传布到那些原来没有自由传统的地方……”,故而,这种“既不能正确地解释欧洲近代史的整个发展,又不能符合现代历史的演进”,更不足以承担起“指导时论的大责”的史观,势必导致“担任这门课程的先生对于这门课程内容的价值丧失了信心”。

### 对当时其他各种史学学说的不足、缺陷的揭示与批驳

20 世纪上半叶,除了维多利亚史观之外,尚有一些其他史学观念或史学思想在当时的美国史学界也颇为流行。这主要是来自于三种学说:一是斯宾格勒、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学说(或曰文明史观学派);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三是源自于美国本土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鲁滨逊所首倡的“新史学流派”(new history,台湾学者称其为“新历史学派”)。这三种学说虽然旨归不一,取法各异,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皆对传统的维多利亚史观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从一定意义上讲,麦克尼尔本人所接受的史学教育和史学实践也与这三种史学流派有着某种关联。郭方先生认为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显然有着某种传承关系。<sup>②</sup>但麦氏本人在对维多利亚史观表示出不满的同时,也对文明史观、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新史学流派等各种史学流派的自身不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又使麦氏多了几个挑战的对象,其挑战的内涵也多了几重色彩。

据刘景辉先生言:“麦克尼尔自承它对西方历史的基本观念早在 1936 年就形成了,那时候,他正好二十岁。这一年,正逢史宾格勒逝世。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书的英译本的全部出版是在 1928 年。……麦克尼尔很可能在高中时代就读过……史宾格勒之死,言论界与思想界的评论,可能触发麦克尼尔去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问题。从这种思考中,麦克尼尔得出他对西方文明与史宾格勒迥然相异的

<sup>①</sup>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 6、8 页。

<sup>②</sup> 郭方:“评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 2 期,第 97 页。

看法”。而“他的整个观念显然是与德国大史学家与哲学家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背道而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sup>①</sup>。从麦氏成名作《西方的兴起》一书的名称和主题中,“我们就不难看出他是有意向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书的挑战”<sup>②</sup>。

汤因比是文明史观的另一位大家,也是麦克尼尔所敬重的一位学者。他同汤因比有着“密切的学术交往”,并专门写过《汤因比学术思想评传》一书<sup>③</sup>,并“对汤因比在大多数专业学者趋于专精之时,以文明的概念为世界史研究注入新活力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汤因比试图将世界所有文化融为一体,表现了从宏观角度探究历史的卓越洞察力”<sup>④</sup>。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麦克尼尔对汤因比学说的全然服膺。邵东方先生就曾撰文,专门就他们二者对“文明”和“文明史”认知的同异进行辨析。他指出,麦克尼尔曾指出了汤因比的四大不足之处:“第一,汤因比未能充分认识到,各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不同的文化人群之间的交流接触是促使文明演变的主要动力。第二,汤因比在着力描述文明时,总是未能明确其定义;而且他对各文明的取舍也常常失之武断。第三,汤因比过分依赖于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的古典范例,因而难于理解其他文明,尤其是非西方文明。汤因比试图将所有文明纳入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的轨道,因此在分析其他文明时犯了许多明显错误。第四,由于受帕格森理论的熏染,汤因比是凭直觉治史,他习惯于首先确定一个观点,然后再选择适用的史实。”<sup>⑤</sup>而刘景辉先生则进一步指出:而刘景辉则进一步指出:麦克尼尔“有意向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书的挑战。再则,他的‘文明扩散论’亦是有意与史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的研究’斗法。他不若史宾格勒、汤因比之将世界各地的文明视作为一个个孤立的文明来研究,来说明他们的自身的兴亡。他是将文明的发展看作整体的发展,他认为世界各地的文明都有他们的相关性”<sup>⑥</sup>。

而麦氏本人在“与汤因比相遇”一文中,曾深情地回顾了当年汤翁的名著《历史研究》一书(前三卷)给他本人带来的巨大启迪以及二人共事合作的愉快时光。然而在论及二人的学术理念上,他说道:“同汤因比一道共事的两年并不像我所期望的那么令人兴奋。实际上,我们二人已经分道扬镳了。”其缘由在于他对汤翁所秉持的

① 刘景辉:《欧洲史新论》,译者序,第2、3页。

② 刘景辉:《欧洲史新论》,译者序,第12页。

③ William H. McNeill, *Toynbee, A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④ 郭方:“评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第97页。

⑤ 参见邵东方:“汤因比和麦耐尔的‘文明概念’”,载《二十一世纪》1993年12月号,第87页。

⑥ 刘景辉:《欧洲史新论》,译者序,第12页。

那种奥古斯丁式的理念无法认同,汤翁认为“历史的确成为上帝向人类展示自我的记录,并且各个文明也都成为各种工具,它们反复的破碎崩塌是在警醒人们向这种超自然实体的回归,因而推动着人性朝着一种更为完善的对上帝的认知迈进”,而“我本人对人类生活所关注的领域——技术的、物质的和生态的——则同那些曾使汤因比痴迷的领域截然相反。他接近上帝,希望到达天庭。我则向下,在尘世的土地上挖掘,渴望对那些致使人类生活得以维系,并致使我们在生物圈中成为独一无二的强大物种的各种物质能量流加以理解”<sup>①</sup>。在他们之间所横亘的是天庭与尘世、神界与人间这道巨大的鸿沟!明乎此,笔者才对一位学者为何以“从汤因比时代到麦克尼尔时代”的提法,作为当时西方“历史学研究所经历的巨大变迁”的表述有了较为深切的体悟。<sup>②</sup>

与此同时,麦氏也将其批判矛枪指向了当时在美国风靡一时的“新史学流派”。在探究维多利亚史观为何长期得不到彻底清算的缘由时,麦氏就非常明确地指出“新史学流派”起到了一种极其恶劣的作用,“在单纯的政治史与宪政史的基干上,已经包上了一层以自由为色彩的外衣,而且,从一开始,其他各种历史论据又粘在自由的外衣之上。此外,文化史,社会史,与经济史等都加在政治史的结构上,于是在历史资料与理论观点纷然杂陈之下,原有的观点与真面目便模糊不清了。这就是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鲁滨逊教授所提倡的‘新历史’的结果”<sup>③</sup>。

如果说麦氏对维多利亚史观和其他史学学派的批判,主要由学理上的不同认知所使然,那么他对新史学的批判则多少有些不同。这种批判的重心不是同其史学观念展开论争,而是对这一学派的学术取向所导致的负面后果予以批驳。他说“鲁滨逊的‘新历史’就是‘各种学术的历史’,研究平民大众的生活方式,物质环境,以及其文化。鲁滨逊的主张得到了史学界广泛的响应,使此后二代历史学家的精力大量地用于实现他的理想上。鲁滨逊的主张使史学家对人类经验各层面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在课堂上做更琐碎的讲解。层出不穷的新论题与新观点一直到现在还能觉得有其需要与价值,主要是因为欧洲史的传统中,还有一道‘自由’的暗流存在,使所

① 麦克尼尔:“与汤因比相遇”(“Encounters with Toynbee”), *New York Times*, Late Edition (East Coast). New York, N. Y.: Dec 29, 1985. pg. A. 1。

② 拉尔夫·克劳伊泽尔:“艺术与世界历史”,《全球史评论》第一辑,第203页。有关麦氏与汤翁之间关系,请见笔者拙文:“人间与天庭——麦克尼尔与汤因比之间的学术渊源与分歧”,《古代文明》2010年第1期。

③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9页。

有的新论题和新观点都有了寄身之所,这个坚实的架构,虽然几乎被新一代历史学家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它还是传衍下来,而且使许多欧洲史课程有了结构上的一致性”<sup>①</sup>。在麦克尼尔看来,与维多利亚史观之间的契合还不是新史学流派的最大弊端,其最大弊端在于一批批史学工作者“纷纷抬举‘新历史’的旗帜,大钻牛角尖。结果,就是历史的研究流于琐碎,过于专门化,这些研究只有学术圈一小群专家感到兴趣,大多数人对这类琐碎研究反映冷淡,毫无兴致”<sup>②</sup>。

“新史学”的兴起,应当说是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史学发展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现象。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国际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新史学流派”在研究范围的拓展、研究重心的重新选择和研究方法的改进等诸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所获得的成就,皆对 19 世纪西方史学传统形成了某种突破。故而它不仅标志着现代美国史学的开端,并且也对世界各国史学研究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看来,麦氏的批驳似乎有过于偏颇之嫌。然而,只要我们细加揣摩思量,特别是从麦氏本人所从事的专业角度和所秉持的理念出发,就会发现他的这些指责与挑战不无道理。首先,他并不是对细小专题研究的价值予以完全彻底否认,而从其本人的诸多研究著述中,时常见到他对许多历史细节的关注与研讨。他所强调和关注的只不过是必须要把那些历史细节的研究同对历史整体大结构的认知形成有机的契合。他指出:“将研究与教学连接在整体的大结构之内是颇为重要的,即使是极为琐碎的研究也不例外。因为历史若无细节,历史是不可想象的,历史若无整体结构,历史也是不可理解的。……若无这种联系,细节的研究仅仅是好古敏求而已。”<sup>③</sup>其次,麦克尼尔之所以对那些打着“新史学”旗号的史学研究感到无法容忍,甚至深恶痛绝,原因还在于它们同他本人对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的功用的认识和期待完全相悖。在他的内心之中,“历史教学在传递西洋文明的薪火方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担当着“培养国民意识”与“指导公众政策的责任”等功能<sup>④</sup>,而这一切均是那些“与人们真正信仰无关,与人们赖以行事的指导原则无关,与人们批判新经验无关”<sup>⑤</sup>的学术旨趣及研究成果根本无法满足的。因而他明确地指出,那些令“美国历史学界过去半个世纪引以为傲的历史研究”,即那些“仅是专题化,仅是扩大新论题的范围与扩

---

①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 9—10 页。

②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 11 页。

③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 11 页。

④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 12—13 页。

⑤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 11 页。

大到世界每一个地区”的历史研究，“绝非解决之道”<sup>①</sup>。

麦氏这种审慎而严厉的批判态度，也延伸到对 20 世纪中叶以后国际学术界一些重大成果的评判之中。如他将 1957—1970 年间陆续出版的《新编剑桥近代史》视为一个“繁琐研究所造成的危机”的典型产物，指责其“缺乏一个贯通全书的主题。内容杂乱无章，实集繁琐研究之大成”，而该书究竟“要阐释什么样的观念与思想，读者实无法掌握，亦无从掌握”<sup>②</sup>。再如，对 196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六卷本的《人类史》第一卷，以及后来所出现的以合作或联合方式编撰的各种关于世界史或人类文明史的著述，麦克尼尔也认为“这些著作‘征集了’‘令人感兴趣的大量史料’；不过，从学术水平来看，它们‘显然未能提供清晰易懂的模式’”<sup>③</sup>。

### 对所谓“科学的”历史传统研究方法的不满

史学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认知活动，它关涉到知识、思维、理念和方法等诸多层面。在对西方 20 世纪各种史学成就的评说和批判过程中，麦氏不仅只关注史学研究的“观念”层面，也将其审视的目光对准了“方法论”层面，显露出了对所谓“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强烈不满。他指出，当时的“历史家未能积极注意欧洲及其其他部门历史的一般形态，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历史专业化的时候，训练青年史学家的研究院课程中，广泛地流行一种浅薄天真的观念——只有科学方法是重要的”<sup>④</sup>。

麦氏将这种科学方法所关注的要点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点：（1）这种方法“所关切的是事实”，并坚信“事实唯有在严格的史料鉴定中才可以发现。一旦偏见和谬误被铲除，真正的事实就会自己陈列出来”。（2）“只有在所有相关的事实——或是几乎所有的事实——被发现后，才可以去做归纳性的论断工作。因为掌握了‘所有’的事实，一个谨慎的历史家才可以让事实来改正他个人的偏见，会获得全盘实在的真相。”（3）“收集所有相关的事实是不容易的。只有研究者把他所研究的范围，设定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收集所有相关的事实才是可能的。因此，一篇理想的论文是：对于一个小题目做最透彻的研究，换言之，就是小题大作。因为所有可获得的相关事实都经过研究者的研判，因此才能有希望得到永久性的，无可

①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 12 页。

②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 11 页。

③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 244 页。

④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 15 页。

批评的,合乎科学的真相。”<sup>①</sup>从这些归纳中,我们发现这种方法其实就是19世纪由德国学者兰克所提倡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它是19世纪西方史学进步与成功的一大标志,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对西方乃至世界的历史学发展一直施加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麦克尼尔也承认这种方法在20世纪中叶前后的美国史学界正处于“方兴未艾”之际,“凡是经过研究院毕业的历史家则无不受其影响”<sup>②</sup>。笔者以为,时至今日,兰克所倡导的这种以求实为目的的研究方法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考究“事实”的“真实性”是史学研究的起码要求,也是史学研究者基本诉求之一。任何一位以史学研究为职业的学者都必须遵循这些原则,麦氏本人也不例外。可他为何又将其贬之为“一种浅薄天真的观念”呢?

然而只要稍加留意,我们便可以找到答案,即麦克尼尔并不是对实证研究方法本身的全面否定,如他曾指出:“19世纪初期,德国出现了‘科学’历史学派。其中最杰出的人物是利奥波德·冯·兰克。他和他的高足坚持对历史的来龙去脉进行比以往更深入和透彻的研究,为历史著述的改革做出很大贡献。通过系统地出版几乎被遗忘的文件资料,历史学家们可以得到大批原始材料。”<sup>③</sup>“他们有条不紊地蒐集,批判,叙述古人对古人自己及祖先的言论。经有无数的学者与历史学家的通力合作,剔出了史料中自相矛盾部分,终于完成了一部有关地球一小部分地区的历史——一部纵深三十到四十世纪,连续的与可信的欧洲大事史。他们的工作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史实,与高度合理的史论,熟悉史料的人,没有不承认他们的成就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世界上有些地区,史料的拣选,整理,与统一的工作仍待史家继续去推动”<sup>④</sup>。他所不满的只是美国史学研究和教育中将这种方法奉为“唯一”的科学方法的做法。因为如此悠远、广博而复杂的人类历史进程,远非是任何一种认知或研究方法所能穷尽的,极端地推崇和过分地仰赖某种特定的认知或研究模式势必导致种种流弊的产生。何况兰克的实证主义方法本身的确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缺陷,对此,诸多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专家们已做出了各种揭示。

麦氏认为,这种方法与规范的流弊主要有以下诸端:(一)这种研究方法和规范“无形中为‘科学的’历史研究的范畴划出了一道明确的界限”,即研究者只能进行

①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5—16页。

②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6页。

③ 麦克尼尔:《西方文明史纲》,第491页。

④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22页。



把他所研究的范围,设定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从而造成繁密、琐碎的“小题目研究”达到“汗牛充栋,泛滥成灾的地步”<sup>①</sup>。(二)“这类规范更使人们怀疑大格局、大体系历史的可靠性及其在学术上的地位”,从而放弃对历史整体大结构的探求。至于“如何将这一类的专题研究融合成一部有意义的历史,则少有人致意。真相就是真相,至于它的大体系,大组织,大架构,不妨留给上帝去处理吧?不然,干脆听其自然”<sup>②</sup>。而这是他深以为憾的一种学术缺陷。有关这一点,我们从前述麦氏对“新史学流派”过分迷恋细节专题研究的批驳态度中就已见得。另外,麦氏早年在对阿克顿勋爵史学成就的评估中就已表明了这种态度。<sup>③</sup>(三)“这种考据式的编撰工作只是历史家工作的一部分。历史家除了考证编纂古人所有关于他们自己的事迹之外,也要追索古人不自觉的其他各种活动。这一类活动并不是可以从史料的表面型态直接看出,而有赖于史家个人的智慧,从史料的字里行间悟出来……那些不愿对文献的内在含义表示任何一间的历史家,只不过是固步自封罢了,他们不会比过去的人知道更多的东西和不同的东西。”(四)“这种缺陷更因另一种心理上的因素更为扩大。因为研究者对于愈来愈小的题目知道得愈来愈多,他可以很快地超过所有的人对这一方面的知识,而成为杰出的专家学者,名利双收。只要这一类专家合理地使用史料,其他学者就不会亦步亦趋地做同样的研究,这样,在缺乏强力的竞争,在缺乏有力的反驳下,这位专家的结论就成为权威的结论,为大家所欣然接受了。这种专家也取得了博学的雅号,其学术地位俨然不可动摇。相信这样的方法是研究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更使得这类钻牛角尖的专家加倍的安全了。因为,其他的人不愿浪费时间去查证一些细枝末叶般的琐细之事。在没有竞争者的局面下,他们成为某一方面的‘南面王’。他们的声势也就更加浩大了。”<sup>④</sup>从这段话中,我们看到麦氏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不满与批判已经超越了其自身的缺陷,直接指向了沉溺于其中并深以为得意的那些史学研究者。其语词虽然尖酸甚至有些刻薄,但在笔者看来却是一段切中肯綮、针砭时弊的好文字。

---

①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6页。

②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6页。

③ “但是,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历史资料收集得越来越多,人们相应地放弃了对历史进行解释和概括的努力。例如,在当时及任何时代都可称为最渊博的历史学家之一的阿克顿勋爵(1834—1902)就是如此。他把撰写伟大的自由史作为毕生的目标,但由于他过度热衷于收集似乎与此有关的资料,却始终未能完成他的巨著。”麦克尼尔:《西方文明史纲》,第491页。

④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6—17页。

## 三

对传统史学和主流学术观念的各种不足与弊端,麦克尼尔皆给予了深刻揭露、严肃批判甚至是严厉鞭挞,然而这些并不是其本人史学主张及成就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主要内容。在笔者看来,麦克尼尔的史学成就更多的是体现在创建一种以世界性或全球性意识为主要取向的宏观、整体而通透的史学解释模式的努力之中。在剖析致使 20 世纪中叶以后美国史学研究在教育濒于衰微的主要原因时,麦克尼尔也清醒地意识到当下的“历史家一方面对维多利亚史观的不满,一方面又不能建立另一个言之成理的理论来取代它”。因而除了传统史学的负面作用之外,“历史学本身没有尽到应该尽的责任也是造成其衰亡的原因之一”<sup>①</sup>。而“与其喋喋不休地批评旧观念(“维多利亚史观”)的错误,不如自己创立一种新的欧洲史理论”<sup>②</sup>。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他强烈呼吁为了启发读者的思想、教授人们一些行事的原则;为了拯救历史学没落的命运,重整历史教学在教育制度中的中心地位,甚至为了“解决历史学者的职业问题”等等目的,应努力地去创建一种充满清新的活力与价值的史学架构、史学通说和史学理论。麦克尼尔曾说,“一个通论性的史观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要有那么一个人提出一项新观念,而这项新观念又能言之成理,还能吸引大家密切的注意,讨论的兴趣”,“这个新理论也能够经得起当代的批评,能够容纳一些必要的史实,最重要的是这一项新的理论能充满清新的活力与价值”。而“从各种零碎的细节中去寻求一种概括性的通论是做学问的一种挑战。从事于这种挑战,学问才会变得有活力,有意义”<sup>③</sup>。

纵观麦克尼尔本人撰著史学著述的历程,可以看到他也一直在努力地践行自己的主张。

1947 年,在获得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后,麦克尼尔赴芝加哥大学执鞭任教。1949 年,他便撰写了《西方文明史纲》,主要用途就是作为“西方文明史”一课的教材,以帮助学生们“获得对西方文明史的范围和连续性的认识”<sup>④</sup>。麦克尼尔的成名

①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 12 页。

② 刘景辉:《欧洲史新论》,译者序,第 11 页。

③ 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 13—14 页。

④ 麦克尼尔:《西方文明史纲》,“致学生”,张卫平等译,新华出版社,1992 年,第 1 页。此书后来分别于 1951 年、1953 年、1958 年、1969 年和 1986 年多次修订再版发行。